

年鉴理论研究存在问题 与解决路径

颜小忠^{*}

摘 要 目前,中国年鉴理论研究滞后于蓬勃发展的年鉴编纂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三个问题是:概念混乱,各说各话,从而造成认识混乱,影响年鉴编纂工作;对中国年鉴学学科体系及其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尚不够系统,不够完善,还有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还未形成;开展年鉴理论和年鉴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虽然已经纳入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规划,但是年鉴理论研究常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针对年鉴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可以有相应的解决路径,即厘清混乱的概念,统一共识,构建独立的年鉴概念体系;全方位开展年鉴学学科体系的各项理论研究,构建系统、科学的年鉴学学科体系;坚持规划指引,建设稳定的年鉴理论研究学术平台,构建起完善的年鉴理论研究常规工作机制。

关键词 年鉴理论 存在问题 解决路径

年鉴界一般认为,中国年鉴是舶来品。从起步之初,它就带有太多西方年鉴的印记,后来融合进中国的思维,逐步改进以及创新。然而,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它的出版数量与理论研究发展始终平平。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完成第一轮地方志书编修的一些市、县志办开始编纂市、县综合年鉴,随后,省级年鉴、专业年鉴等进入人们视野,中国年鉴开始迅速蓬勃发展。2020 年,三级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即将达到全覆盖。40 年来,由于第一、二轮地方志书编修相继在全国开展,伴随各级各类志书编修发展,各级各类年鉴编纂也发展得十分迅猛。各级各类地方志、年鉴机构由于人员少、任务重,大多忙于志书、年鉴日常的编纂工作,即便偶尔做一些年鉴理论研究,也多是侧重解决编纂实践的编纂理论。这种工作状况,造成年鉴理论研究长期处于“慢作为”阶段。各级各类年鉴的实践经验既没有完全、系统地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既有理论也难以有效指导年鉴的编纂实践与发展,有许多基本的概念、基础的理论还比较混乱,

^{*} 颜小忠,男,江西省萍乡市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方志学、年鉴学。

还没有成为年鉴界大多数人的共识,还谈不上系统与成熟。可以说,目前中国年鉴理论研究还滞后于蓬勃发展的年鉴编纂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本文仅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能对今后年鉴理论研究的发力方向有所裨益。

一、构建独立的年鉴概念体系

目前,年鉴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概念混乱,各说各话,不成体系。诸如年鉴、年鉴学、年鉴文化、年鉴性质、年鉴功能等基本概念的定义,缺乏定论,没有共识。比如最基本的“年鉴”的定义,最常见的描述有两种,一种是“工具书观点”,代表性的定义是1990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出的:“汇编一年内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①另一种是“资料性文献观点”,公认规范性的定义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的:“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②本来,前者定义的是“年鉴”,后者定义的是“地方综合年鉴”,并不是对年鉴下定义。然而,相当多的论文将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视同为年鉴定义,将其作为“资料性文献观点”的代表性定义来与“工具书观点”的定义相比较。就这两种观点的定义而言,前者定义其特征的关键词是“汇编/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工具书”,定性词是工具书;后者定义其特征的关键词是“系统记述/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资料性文献”,定性词是资料性文献。二者的记录方法(前者为汇编,后者为系统记述)、内容(前者为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后者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范围(前者无,后者为行政区域)、本质特征(前者为工具书,后者为资料性文献)并不一致。代表性观点的定义尚且差异很大,本质不同,那么,由定义(定性)出发的编纂组织形式、资料收集范围、体例体裁、框架结构、撰写方法等自然就大相径庭。

实际上,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只对地方综合年鉴作出定义,并没有对年鉴下定义。地方综合年鉴只是年鉴之中的一类年鉴,在其之外还有专业年鉴、行业年鉴、企事业单位年鉴等,如各级各类经济年鉴、银行年鉴、教育年鉴、文化年鉴、博物馆机构年鉴、高校年鉴、学术年鉴、大型企事业单位年鉴等。国家级专业、行业年鉴,如《中国铁道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各级各类开发区、示范区年鉴,如《中关村年鉴》等。除三级地方综合年鉴之外,还有非三级行政区域的行政区域年鉴,如镇、村级年鉴;非行政区域的区域性年鉴,如《塔里木石油年鉴》(收录塔里木盆地内石油企业和服务单位情况)等。还有城市年鉴,划归三级地方综合年鉴,还是非行政区域的区域性年鉴?类似这些各级各类型年鉴如何分类,如何定义,都是年鉴理论研究需要亟待解决的课题。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②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还有,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各级各类地方综合年鉴、专业年鉴、行业年鉴、企事业单位年鉴、非行政区域的区域性年鉴等的特征给它们下定义,那么这些概念定义是否可以把国外的各级各类类似年鉴包括在内?因为,当代中国年鉴和西方年鉴在编纂理念、组织模式、内容记述、出版发行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有的甚至是本质的不同。是否可以把纸质年鉴、网络年鉴也都包括在内?近些年出现的网络年鉴、智慧年鉴、年鉴的“互联网+”概念,三者之间有何不同?它们的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许多都是脱胎于传统的纸质年鉴,但它们与纸质年鉴又有何不同,有多少不同,有多少交叉,目前研究也比较欠缺。

另外,中国和世界是不是还有除上述各类年鉴以外的其他年鉴,这也是一个未研究透彻的理论课题。如果对年鉴和网络年鉴、学术年鉴、城市年鉴、专业年鉴、开发区年鉴等基本概念的研究尚且不全面、不清底、无共识,给它们下的定义不一致、不明确、各说各话,那么其他研究是难以深入下去的。任何学科研究,基本概念都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体系大厦建筑的基石,没有逻辑起点,没有建筑基石,其他理论研究都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

再如,年鉴的功能定位,目前论述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没有明确的说法和普遍被认可的共识。最多见的观点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多功能说,一种是单一功能说。雷卫群、陈晓婧指出:“年鉴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年鉴界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对28部省级综合年鉴的功能进行细化,可以分出9项功能,分别是保存资料、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研究人员提供材料、为修志积累材料、窗口作用、礼品书、为民族团结服务、教化等功能。”“虽然统计出来的省级综合年鉴功能多达九项,但由于编纂者对年鉴的理解不同,各家年鉴的功能定位相差较大。如《湖南年鉴(2016)》只表明‘存史’一项功能,而《四川年鉴(2017)》则有多达七项功能,说明不同地区对年鉴功能的要求不尽相同。”^①从上述分析、论述可以看出,28部省级综合年鉴作为各级各类年鉴代表的功能定位尚且如此各说各话,其他年鉴的功能定位更是五花八门,缺乏定论。杨军仕、王守亚等提出:“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可以资政、存史、育人。”^②这个定位和地方志的“存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一致,也为相当多的年鉴理论研究者所认可,特别是“存史、资政”两项功能认可度较高。《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则提出,年鉴的作用为“服务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科学决策,辅助科学研究,宣传地方(行业、部门)情况,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保存年度资料文献”^③。该规划提出了年鉴的五项作用。还有学者提出年鉴有三大功能和四大作用,也有的专著提出年鉴具有五种基本职能和七大价值。另外,在多功能说和单一功能说之外,还有提出基本功能或首要功能说的。崔震提出:“存史(保存资料)应为年鉴的首要功能,其他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存史为基础。”“网络年鉴应主要承

① 雷卫群、陈晓婧:《试论省级综合年鉴的功能细化问题——28部省级综合年鉴功能分析》,《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4期。

② 杨军仕、王守亚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③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6年12月22日。

担传统年鉴的工具书作用。”“纸质版年鉴作用定位于宣传。”^①雷卫群、陈晓婧也提出:“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研究人员提供材料、为修志积累材料功能,这四项功能公认度较高,值得年鉴编纂界认真探讨,并在所有年鉴编纂中推广并强化其基础功能定位。”^②他们主张的是年鉴具有多种功能,但又强化首要功能、基础功能。

凡此种种,定位各异,表述各异。非常明显,功能表述不一,编纂者无所适从。功能定位不一,编纂的组织形式,年鉴的框架设计、资料选取、内容详略、编辑出版必然各有不同。如果年鉴定义为年度资料性文献,功能定位于主要为领导决策服务,那么,该年鉴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领导者提供本行政区域(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当年度系统的地情资料,以供领导者决策所用。该年鉴的框架设计就要注意门类齐全,工作部门齐全,层层情况不漏,资料选取要侧重宏观、全面、系统、权威、真实、典型,内容记述要科学、客观、秉笔直书,优势劣势清楚,存在问题清楚。因而,其框架设计、资料(图照)选取、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的处理,和定义为年度工具书,功能定位为窗口作用、礼品书、为民族团结服务、教化等的年鉴,必然大不相同。

综上所述,年鉴编纂理论要发展,年鉴事业要发展,厘清年鉴界各说各话、缺乏共识、表述混乱的概念,建立起大家共同认可的概念及其体系是当前年鉴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无效的实践。如果我们能够结束以往概念的混乱,建立起科学的年鉴概念体系,就可以有效地奠定整个年鉴学学科体系的基础,进而确定年鉴学的分支学科及其内容,从而科学地指导年鉴编纂,发展年鉴事业。

和方志学等其他学科一样,年鉴学的概念体系一般包括:基本概念,这是年鉴概念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年鉴概念体系、学科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如年鉴、年鉴学、年鉴文化、年鉴功能、年鉴性质等;一般概念,基本概念外的普通概念、次要概念,如依法编鉴、编纂模式、编纂体例、框架结构、分撰、统稿、总述、综述、概述、概况、类目、分目、条目等;专业术语,年鉴界通用、约定俗成的专业用语,如千鉴一面、官办官修、述而不论、升格处理、以人系事等。所以,今后年鉴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是按照年鉴概念体系的三类概念:基本概念、一般概念、专业术语来分类界定所有概念,要厘清各种定义混乱的概念,明确其定义,并各归其类,还要从建立完整的年鉴概念体系的要求来完善、补充目前还没有涉足或研究不够深入的一些概念。只有把年鉴特有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概念体系构建起来,才能有效消除年鉴编纂思想的混乱,使年鉴编纂工作走上统一发展的正确轨道。

二、构建较为成熟的中国年鉴学学科体系

中国年鉴学学科体系的提出,一般认为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6年,肖东发

^① 崔震:《网络年鉴创新途径的探索》,《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第2期。

^② 雷卫群、陈晓婧:《试论省级综合年鉴的功能细化问题——28部省级综合年鉴功能分析》,《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4期。

提出建立年鉴学,对“年鉴学”及其学科体系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①同年,肖东发、陈慧杰提出“建立一个系统的年鉴研究体系——‘年鉴学’”^②。如果以1986年作为提出“年鉴学”标志的话,至今已经三十多年。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③2016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印发的《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建立和完善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④构建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成为“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年鉴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三十多年来,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年鉴界领导、专家、学者、理论研究者和编纂工作人员在积极编纂地方志书、年鉴、地方史书,努力完成“两全目标”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年鉴理论研究工作,发表了一批年鉴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年鉴理论专著,但是,离构建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还较远,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根据周旭在《对我国年鉴学发展的思考》一文中从文献检索角度进行的一次不完全统计看,从1987年到2014年,全国年鉴理论专著共有45部。从该文所列45部著作看,从学科角度研究构建年鉴学学科体系的专著,似乎只有王斌的《年鉴学浅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程磊的《年鉴学》(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90年),肖东发的《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梁耀武的《地方年鉴学概要》(云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肖东发、邵荣霞的《实用年鉴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卢万发等的《中国年鉴学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肖东发等的《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等,数量不到10部。在分析了一系列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著作之后,周旭认为:“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年鉴学’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仍是一门正在发展完善的学科。‘年鉴学’的概念体系还没有形成,甚至于还没有一定量的年鉴学科所特有的概念,呈现出与方志学、编纂学、报刊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度不大的问题。”“‘年鉴学’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及其体系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⑤这是周旭描述的年鉴学学科体系研究状况,此后情况如何呢?从笔者近年看到的《中国年鉴研究》自2017年创刊以来所刊载的一百多篇论文和近几届全国年鉴论坛的三百多篇论文来看,从学科角度研究构建年鉴学学科体系的论文也就十多篇,能比较科学、系统论述完整的年鉴学基础理论和各分支学科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可见,形成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还任重道远,需要研究人员全方位去发力,攻克一个个空白或薄弱的研究课题,尽早构建起较为成熟的独立的年鉴学学科体系。

巴兆祥在《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中说:“按照学科学的理论,学科

① 肖东发:《年鉴学刍议》,《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肖东发、陈慧杰:《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辞书研究》1986年第2期。

③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④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6年12月22日。

⑤ 周旭:《对我国年鉴学发展的思考》,《中国年鉴研究》2018年第2期。

应该是个独立的知识子系统或大学中一个专业建制,一个学科的成立必须具备‘独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时代的必然产物’‘学科创始人与代表作’‘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等五个基本条件。”^①中国年鉴已经快速发展四十多年了,中国年鉴学是否已经具备“独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是否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必然产物,是否已有自己的学科创始人及其经典代表作,是否已有精心营建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它们是否在年鉴界已经取得大家的共识,这些理论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努力去解决的课题。

和古老而又年轻的方志学的构建不同,关于中国年鉴学的构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那就是,虽然方志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或是二级学科目前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它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门学科,称中国方志学或方志学并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年鉴一般认为是源自西方,发展到现在它有很多地方与西方年鉴并不一致。目前,我们对西方年鉴的研究还很不深入,中、西方年鉴到底有多少不同?有哪些重要的不同?我们的年鉴学是要构建包括中国和西方年鉴都在内的年鉴学,还是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抑或中国年鉴学?这恐怕先得论证一下。首先,确定好它独有的学科定义、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才能再去研究其他理论问题。就目前来讲,将年鉴学构建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还是作为方志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也需要认真研究。我们要构建的年鉴学,它和方志学的关系如何?它是否已经具备一个学科成立的五个基本条件?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后确定。年鉴学如果作为独立的一门学科,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年鉴文化,也就是说中国年鉴学是研究中国年鉴文化发生、衍变及其发展规律的一个学科。和其他学科结构一样,它由基础科学理论、技术科学理论和应用科学理论构成。中国年鉴学的基础科学理论学应该包括中国年鉴文化、年鉴工作指导思想、年鉴学科概念、年鉴性质、年鉴特点、年鉴功能、年鉴学科体系构成及其构架依据、年鉴方法论、年鉴史学等。年鉴学的技术科学理论应该包括年鉴编纂技术学和年鉴管理技术学。年鉴编纂技术学下分综合编纂技术和分类编纂技术。综合编纂技术包括编纂原则、规范要求、资料工作、框架设计、编纂流程、撰写技术、分撰、统稿、评议、审稿、出版等的技术。分类编纂技术包括网络年鉴、地方综合年鉴、专业(行业)年鉴、企事业单位年鉴、非行政区域的区域性年鉴、其他年鉴等的编纂技术。管理技术学包括年鉴编纂管理、年鉴人才管理、年鉴质量管理、年鉴资料管理、年鉴网络管理等。年鉴学的应用科学理论包括年鉴整理与应用、年鉴馆库网络建设、年鉴资源开发利用、年鉴文化服务经济和社会等。

以上仅仅是笔者初步设想的中国年鉴学的二、三级分支学科组成,姑且不论其完整、齐全、准确与否,仅仅就上述分支学科而已,就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去发力研究,填补空白,克服不足,完善薄弱,升华理论,进而如期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有必要由中指组组织全国各级各类年鉴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共同来编纂一部《中国年鉴学概论》,先统一在年鉴基础理论上,特别是中国年鉴学学科体系的架

^① 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3期。

构上达成基本共识,以后再按各分支学科分头攻关,构建起较为科学、系统、成熟的中国年鉴学或年鉴学。

三、构建年鉴理论研究常规工作机制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等外宾时,对陪同会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①此后,年鉴事业开始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前期,率先完成第一轮地方志书编修的一些市、县志办,有的由于缺乏后续常规工作任务,于志书完成出版后,事终人散,机构被撤销。面对这种困境,一些志办按照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关于编纂省、市地方年鉴和县志资料汇编的建议,开始编纂市、县级地方综合年鉴。因为有了一年编纂一部年鉴的常规任务,这些机构得以保留。1985年4月,中指组印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18条规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县地方政府主持下,建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设置相应的修志常设机构”,各地编纂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辑出版地方年鉴”。自此,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进入依令编鉴的阶段。“据统计,至2005年底,全国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共编纂646种,其中省级32种(不包括《兵团年鉴》则为31种)、市级208种、县级406种。”^②2006年,国务院印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8条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由此,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进入政府依法编鉴阶段,年鉴事业开始迅猛发展。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和年鉴理论、年鉴学学科体系建设有了顶层设计,进入规划指引、依法治鉴的阶段。截至2015年,全国已出版“1.5万部地方综合年鉴,1000多种、7000多部专业年鉴”^③,“已出版各种志鉴理论著作1000多部,发表论文6万多篇,取得显著成果,有力地指导了地方志工作开展,推动了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④。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有了顶层设计,规划指引,依法编鉴、治鉴,地方志鉴的编纂与理论建设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虽然,相对于地方志理论著作、论文的数量和方志学科的建设,年鉴理论专著、论文数量和学科建设明显落后,但是,年鉴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毕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周旭所统计,1987—2014年全国年鉴理论专著已有45部。其中,关于年鉴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专

① 崔震:《邓小平同志年鉴谈话考证》,《江苏地方志》2018年第1期。

② 中国地方志年鉴编辑部:《中国地方志年鉴(2006)》,2006年,第386页。

③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④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著及论文,虽然还谈不上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但是毕竟有一个较好的研究基础,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编纂者参与其中。只要继续坚持顶层设计,规划指引,依法治鉴,制定好2021—2025年地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继续建立起完善的年鉴理论研究和年鉴学学科建设的常规工作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地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假以时日,独立、成熟的中国年鉴学和年鉴学(包括中国年鉴和西方年鉴)必将早日建成。

要建立起年鉴理论和年鉴学学科建设的常规工作机制,除了将其纳入顶层规划以外,还要建立起常规的学术平台。刘永强指出:“从全国情况来看,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对年鉴理论研究的重视不够,鼓励和支持也不够,年鉴理论研究滞后于编纂实践的问题仍比较突出。除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及北京、吉林、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每年坚持举办论坛、研讨会等年鉴学术活动外,其他省(区、市)组织开展相关学术研讨活动很少,学术平台建设较为落后,学术氛围不够活跃,学术交流和思想争鸣不足,年鉴理论研究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中指办主办的《中国年鉴研究》期刊作为年鉴界唯一的公开性学术期刊,长期面临组稿困难,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较少,造成学术影响力相对有限,引领推动学科建设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①虽然,年鉴理论发展和年鉴学建设还不太理想,不少省(区、市)还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年鉴学术平台和常规的年鉴理论研究工作机制,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中指组及北京、吉林、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建立了一些期刊、论坛、研讨会等常规的年鉴学术平台,每年坚持举办全国、全省(市)范围的论坛、研讨会等年鉴学术活动,在《中国年鉴研究》和各省(区、市)方志期刊上发表年鉴理论文章,因而有效地调动起广大年鉴理论研究者的积极性,汇集起地方志工作机构、年鉴编纂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等各路专家、学者及理论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其事,才使得年鉴理论研究取得发展。尽管它滞后于年鉴编纂实践的发展,离形成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是建立期刊、论坛、研讨会等常规的年鉴学术平台,建立年鉴理论研究的常规工作机制,无疑是帮助、促进、保证年鉴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之一。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指出:“充分发挥方志期刊和各级地方志学会的作用,活跃学术研讨,推动理论建设。加强与相关学科交流合作,开展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研究,编写方志学、年鉴学通用教材及各分支学科研究论著。”^②所以,今后中指办及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地方志学会都有必要建立起常规的年鉴理论研究学术平台,定期举办各类专题的年鉴理论研究论坛、研讨会、笔会等学术活动,利用期刊刊发年鉴理论研究论文,有条件的还可以设立年鉴理论科研基金,开展立项课题规划、资助、审定工作,对于优秀、杰出的年鉴理论成果可以进行表彰。要认真做好学术引领,有目的、有步骤、有重点地集中研究年鉴学的特有定义与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的构成及依据、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领军人物及其经典著作等,编写年鉴学通用教材、

① 刘永强:《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方向》,《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5年8月25日。

年鉴学概论及各分支学科研究论著。只有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常规的年鉴学术平台,并形成常规的年鉴理论研究工作机制,年鉴学术氛围才能保持活跃,学术交流和思想争鸣才能激烈,学术难题才能逐步解决,较为科学、系统、成熟的中国年鉴学学科体系才能建成。

四、结 语

当前,年鉴事业正处于全面推进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三级地方综合年鉴陆续进入如期完成“年鉴全覆盖”的收尾阶段。已经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地方,在巩固年鉴编纂、出版成果的同时,有必要从“数量增长型”转变为“质量增长型”。要提升年鉴质量,就需要不断推进年鉴理论创新,并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进实践创新。不仅要创新年鉴编纂理论,更要寻找新的年鉴理论增长点。由于年鉴、年鉴学、年鉴功能和年鉴研究对象等独有的学科定义在年鉴界尚有较大争议,各说各话,不成体系,所以当前年鉴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要厘清年鉴界混乱的基本概念、一般概念和专业术语,构建起独立的年鉴概念体系,让它具有学术话语权并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由于年鉴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级别的有序组织的系统结构,具有多层次多门类的众多内容,所以我们要有序组织,联合各级地方志、年鉴工作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研究单位与研究人员,分工合作,分头负责,全方位开展年鉴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理论和二、三级分支学科理论等各项理论研究,从而构建起系统、科学的年鉴学学科体系。

四十多年的年鉴编纂实践和理论发展告诉我们,从依令编鉴到依法编鉴,再到依法治鉴,正是因为有顶层设计,规划指引,依法编鉴、治鉴,中国年鉴的编纂与理论建设才进入快速发展通道。所以,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年鉴理论研究仍然要以规划为指引,努力建设稳定的年鉴理论研究学术平台,构建起完善的年鉴理论研究常规工作机制。要发挥《中国年鉴研究》期刊的学术平台作用、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分会的学术阵地作用,团结联系全国各地的年鉴研究团体、研究人员,积极组织年鉴编纂研讨活动,努力营造上下联动、内外合力的浓厚的理论研究氛围。“加强与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吸引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投入到年鉴研究中来,广泛参考借鉴各学科研究理论、方法和综合吸纳各学科专业知识、成果,积极研究解决年鉴编纂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快推进年鉴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争取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大大拓展年鉴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①只有中指组和各级各类地方志、年鉴工作机构都建设起常规的年鉴理论研究工作机制,年鉴理论研究才能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有效指导各级各类年鉴的编纂,进而提升年鉴质量。

责任编辑:范锐超

^① 刘永强:《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方向》,《中国年鉴研究》2020年第2期。